

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求索

孙孝科

(南京邮电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六大战略思想:社会主义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前提,高度发达的农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体制保障,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动力,合理的工业布局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要素与军事需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赶超战略。深入挖掘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反思其中的某些失误与教训,对于我国当前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工业化;发展;工业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2-0102-06

毛泽东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形成了他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六大战略思想,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初步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

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前提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阻碍。作为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国,曾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老手工业以及高度发达的文化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把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6世纪。从18世纪开始,随着英、法、德等国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入侵,中国便一步一步地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列强入侵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列强们尽管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矿企业,但是其真正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的工业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以此实施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直接挤压,从而达到直接阻碍中国独立发展工业之目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沦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之大片土地沦为日手。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广大地区丧失了发展中国自身工业的基础条件。

二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发展自身工业。其中,中国买办阶级因为其直接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服务并为其所豢养的本性,因此也和西方列强一样千方百计地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迫切要求,但由于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客观上很难有独立发展中国工业的能力和实力。事实上,中国民族工业尽管经历了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的近80年的历史发展,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三是前苏联发展工业的榜样效应。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自1925年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经济仍然获得了高速发展。在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间,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近6倍,年均增长17%,基本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却大都花了几乎一二百年的时间。苏联迅速发展工业的成功经验无疑给了毛泽东极大鼓舞,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发展中国自身工业的自信心。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近代社会及其工业化发展的深入省察,以及对前苏联成功发展工业化的深切了解和体悟,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81}可见,毛泽东在此预示,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工业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无异于纸上谈兵。换言之,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制度前提。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其目标便是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而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二、高度发达的农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发达的农业就没有发达的中国工业。因此,对于生于农村且对农民具有深情厚意的毛泽东来说,重视农业思想的形成显然离不开其意识深处深厚农村情感之自然诉求,同时更是其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深切体认。

早在1934年,他就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第一位的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虽然提出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为了不使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影响到农业,进而又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思想。他说:“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有人负责,搞不好不行。”^{[2]156}“搞农业的需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1]673}

50年代末,毛泽东又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等著名论断,并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对于工业发展的产业基础作用。究其原因有四:其一,毛泽东看到了农业发展对于工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用。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人口和工业生产提供其必需的农产品,也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撑,更才能为整个社会的安定提供坚实的保障。1959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了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思想。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所谓农轻重,就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其二,农业关系到工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首先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会拥有广阔的市场。其三,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业服务的。其四,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三、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体制保障

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我党领导下的工厂在经营管理上尽管进行了一些局部变革,但是总体上大都以行政管理为主。直至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除了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与财政工作总方针外,还提出了实行工厂管理一元化、实行经济核算制、改革工资制度等一系列经营管理制度。解

放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进而提出了加强民主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经营管理制度。这些经营管理制度的提出与实施为建国后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

建国后,在企业管理制度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更是进行了长期而又艰辛的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重要举措。

一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了克服“一五”期间我国企业在学习苏联企业管理制度、方法过程中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而忽视民主管理等弊端,1960年3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我国企业要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再次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针的正确性与必要性。通过我国许多大型企业对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的陆续试行,1961年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更是正式肯定了这种制度,并且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尽管上述举措在我国企业探索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以及企业管理中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左”的错误,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和企业管理上的大混乱。

二是试办托拉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较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其优势在于机器设备利用较为合理,效益较高。组织托拉斯,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也是上层建筑的改革。正是由于对托拉斯这一组织管理形式的作用和优势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探索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既要向本国资本家学习,又要向外国企业学习,“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3]742}。1964年8月17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批转国家经委党组下发《关

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企业,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三是提出了工业化制度安排的两大设想。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388}。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设想。显然,上述两大方面设想的提出,源于毛泽东对于当时所坚持的单一公有制以及所实施的单纯计划经济体制带给国家工业、经济发展消极与负面影响的敏锐省察与反思。

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动力

诚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极为丰富的内涵。不过,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出发点与着力点显然放在中国工业化或经济发展之上,并且还超越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外,前者或许缘于毛泽东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尽快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的急切诉求,后者则可以从他40年代对于争取外资合作对象不是苏联而是美、英的选择上得到印证。至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应该说既带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的深刻印记,又来源于毛泽东对于闭关锁国带给中国近代工业乃至社会发展深重灾难的省察反思,以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对外开放思想中有益成果的批判继承,更是其亲历实践的艰辛求索与勤于思考、长于归纳的理论创新之产物。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5]129}。这是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

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

作”^{[6]171}。当时,毛泽东设想,通过与美英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可惜,在当时的形势与条件下,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指向国民党,从而使得这一设想只能有限地实现。

在与国外经济合作以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方面,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系统阐述了中国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外资与科技利用、合作对象与合作原则的选择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思想,尽管有些思想后来根本未予付诸实施。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以及建国后所制定的相关对外经济合作的文件中。

一是中国工业化要利用外资和外国科技。毛泽东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1945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又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20-21}。

二是美国是与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毛泽东说,“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在经历了二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7]20-21}。

三是中美经济合作可以实现互补双赢。为了说服和推进中美经济合作,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经济合作对于双方的利益。他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同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和往来,只会实现使中美双方在经济上的“取长补短”,而“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的中国“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尚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即使中国以后“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所建立的轻工业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

中国也只会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而美国将得到中国发展轻工业所提供的“投资”场所,得到自身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还得到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料和农产品”以作为其对中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7]20-21}。

四是中外经济合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提出。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政府忽视发展民族工业,而一味依赖外国政府供应哪怕是像棉布等这样的日用品的现状深有感触,更对其因为自身不能生产这些产品并因此处处受制于人的境况有着痛切肺腑的认识,这些无疑均助长与提升了毛泽东急切发展本国工业的强烈诉求,尽管不可否认其也有着对于外援的热切渴望。虽然毛泽东非常希望美国能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但是他仍然不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20-21}。

新中国诞生之初,我们党和政府便曾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原则下与一切国家做生意。而表现在实践上,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及贸易往来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且还试图通过其他途径与西方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开放,引进了诸多国外先进技术,有力地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

五、工业布局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要素与军事需求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合理布局工业。布局工业,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解放初期我国的工业多集中在沿海。据1952年的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仅占30%左右,钢铁工业约有80%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于辽宁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当时钢铁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

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而在各主要产棉区,纺织工业几乎空缺。工业布局的不合理造成了区域工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较大失衡。

对于新建工业的布局,则主要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资源利用。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二是军事需要。编制“一五”计划时,朝鲜战火仍未熄灭,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之声甚嚣尘上,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的工业企业放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当然造船厂等除外。三是改变落后地区经济面貌也即加快内地发展。对此毛泽东特别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8]26}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和国家将“一五”期间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多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诚然,在落后地区建些项目,既可以带动其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等的发展,也便于其城镇人口就业。当然,上述三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更为根本。

毛泽东在布局内地工业的同时仍然强调:“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8]“一五”期间的工业布局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发生了显著变化,1957年内地所占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工业因此随着国家投资比重的提升有了较大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印边境事件频发以及蒋介石阴谋窜犯大陆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战争威胁的不利局面,再加上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上的差强人意等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而果断地做出了工业重新布局中的规模空前庞大、领域涉及广泛、历时长达十年的三线建设这一重要举措。从1964年开始,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建设即所谓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且成就辉煌。一是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二是改变了内地的交通闭塞状况。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等五条铁路干线,形成了西南地区的交通骨干网络,为这些地区矿产与资源的开发及其

工业布局和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局面。大量东部、沿海工业的西迁,改变了中国过去的工业布局,初步实现了东部、中部、西部工业的协调发展。

当然,在三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勿容置疑地出现了某些失误和不足。如由于过分强调军事与备战需要而挤占了经济建设领域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人、财、物资源,并进而直接影响了沿海工业与经济的发展;出于战争考量而导致的工厂选址不当所造成的企业生产成本高昂、生产效率低下乃至浪费现象严重等等。

六、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赶超战略

新中国建立之初,可供选择的工业化模式大体有三种:一是欧美式的传统型工业化,也即以轻工业起步,重工业跟进且最终取代轻工业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化。英、美、日等国的工业化概莫能外。二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家政权干预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工业化。三是苏联式的追赶型工业化,也即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便是追赶型工业化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基础差、起点低的情况下起步的。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式的追赶型工业化,既缘于我国与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即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威胁)极为相似,又缘于我国工业化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更缘于建国之初的中国在军事、工业、经济等领域的急于赶超。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重工业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重工业既集中了先进科技成就,同时又能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当时,我国的重工业状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712}因此,惟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其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才能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也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以巩固和发展新中国。

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始于1953年。1956年前后,针对“一五”计划前期我国过分强调发展重

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在深刻审视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和苏联传统模式之后,初步提出并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方案和做法。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8]25}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796}

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以钢为纲”错误方针的指导,片面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挤占和影响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并进而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甚至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定。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值得欣慰的是,1961年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当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农轻重关系上,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发展工业的方式上,提出工业与

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

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些正确结论,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仅为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模式选择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而且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总之,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无论是在理论探究抑或是在实践效果方面都结出了累累硕果(当然其中也包括业已成为教训的某些失误),而这些又为当代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健康、快速推进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极富启发性与借鉴性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 邓力群,等.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5]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Mao Tse-tung's Seeking for the Industrialized Way in China

SUN Xiao-ke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With his hard explorations of the industrialized way in China, Mao Tse-tung formed six strategic thoughts as follows: Socialism is the systematic premise of the industrialized development in China, highly developed agriculture is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advanced system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ulti-directional opening-up is the external impetus; reasonabl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ilitary requirement;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s the surpassing strategy. It means both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urrent new-style industrial advancement in our country to study and summarize Mao Tse-tung's strategic thoughts of the industrialized way in China with reflections on their failures and lessons in the meantime.

Key words: Mao Tse-tung;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development; industry

(责任编辑:刘云)